

主题研究：区域经济与制度研究

# 禀赋约束与制度演进视角下的 外向型经济发展

——以浙江省台州市为例

史晋川, 吴晓露

( 浙江大学 经济学系, 浙江 杭州 310027 )

[ 摘 要 ] 台州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内源性民间资本的积累,“ 互助 ”型的地方政府及发达的专业市场,是最大化自身收益的最优选择结果。这种独特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不仅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素材,也为严重缺乏资金和企业家资源的西部欠发达地区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来拉动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能的借鉴。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证明了并不存在评价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优劣的统一标准,关键在于寻找到最适合本地区特点,能在现有约束下,最大化自身收益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 关键词 ] 外向型经济发展;要素禀赋;制度演进

[ 中图分类号 ] B25

[ 文献标志码 ] A

[ 文章编号 ] 1008-942X(2005)06-0034-11

不同国家或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演进路径和经济绩效有明显差异。经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这种差异源于当地要素禀赋约束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关系。但探讨外向型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的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改革开放后,外向型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显著推动作用,较少论著选择特定个案,从要素禀赋与制度演进约束下探求一个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变迁与成因。本文以台州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调查资料为基础,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特定外向型经济发展是初始要素禀赋约束和制度变迁路径共同演进的结果这一研究视角切入,对其演进特征与形成根源进行实证研究。

## 一、禀赋约束与制度演进的结果 演进特征

台州,地处浙江中部沿海,人口 540 万,陆地与海域面积约 9 411 和 20 000 平方公里,占全省海域总面积的三分之一,海岸线长 745 公里,约占全省海岸线总长的 28%。受自然资源限制,历史上台州当地的居民以经商为主业,便利的沿海区位优势使其成为沿海最早开展海外贸易的地区之一。改革开放后,当地外向型经济经历了从恢复起步到发展腾飞,从单一对外贸易到全面推进的发展历程,初步形成全方位的开放型经济格局和独特的发展轨迹。

[ 收稿日期 ] 2005-07-08

[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 作者简介 ] 1. 史晋川(1957-),男,山西武乡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现代西方经济学、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法与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研究;2. 吴晓露(1978-),女,浙江缙云人,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理论、法与经济学理论方面的研究。

## (一) 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历程

建国后,台州外向型经济的恢复发展分四个阶段。(1)单一对外贸易萌芽恢复阶段(1949—1978)。在这一时期,台州的对外贸易逐步恢复,从最初主要对前苏联及东欧国家出口,向世界各国扩展,1976年国家实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后,出口增长显著。50—60年代,台州主要承担出口生产货源的收购调拨;1973年台州设立了外贸专门机构,开始组建外贸公司出口销售渠道。(2)出口商品综合基地起步阶段(1978—1985)。现代意义的外向型经济自78年起步,1979—1987年成为全国33个出口商品基地之一。80年代初,外贸部门开始组建工贸联营企业及兴办自属出口企业,台州也有了很大发展。此时,台州主要外向型经济模式是传统单一对外贸易。(3)全方位外向型经济发展阶段(1985—1994)。地区开放格局初步形成,椒江、临海、温岭列入沿海经济开发区,海门港正式对外轮开放,外贸体制改革后,自营出口起步,全方位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初步展开,第一家外资企业(临海华侨宾馆)的成立,打破了单一靠内源式民间力量推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格局。同期,台州开始向台湾渔轮输出渔工的对外经济合作,天台山美术馆在新加坡创办的中国特艺公司拉开了境外投资序幕。(4)全方位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阶段(1995—现在)。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对外投资齐头并进、综合发展。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增长,形成以民营企业为主体,外贸公司、生产企业、三资企业齐头并进的外贸格局,利用外资规模扩大,质量提高,对外经济合作、对外投资略有成就。

## (二) 外向型经济的现状特征

经过多年积累,台州外向型经济已初具规模,形成独特的发展轨迹与成长模式,具有与国内其他地区明显不同的特征。

首先,从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看,外向型经济基础薄弱,增长势头较强劲。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台州经济外向度较低,2002年,外贸、外资依存度只有21.1%<sup>①</sup>和1.1%(浙江省与全国平均分别为45.3%和27.9%,50.2%和4.5%),低于同期GDP在浙江省排名。但在1994—2002年间,台州外贸进出口增长较快,年均增幅高于浙江和全国平均水平(台州为129.6%,后两者为117.6%和106.2%);但台州利用外资极为薄弱,外资企业进口增幅大于出口增幅并大大超过投资增幅(投资年均增幅仅为20.9%,而相应进出口增幅为34%,其中出口31.7%,进口48.5%)。换言之,台州外资企业发展势头欠佳,在资源、经济基础、交通运输及劳动力等方面都不具备吸引外商投资的经济、技术优势。

其次,从微观经济基础看,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民营经济是外向型经济的主体,对外贸易方式以生产企业自营出口为主。与固有经济状况及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外贸经营权下放相适应,外贸体制改革后,台州不再有国有外贸企业。截至2002年年底,有自营出口权的民营企业四百多家,占总出口企业半数以上,国有、外资、民营企业出口比约为1:1:2,民营企业出口比重明显高于浙江及全国平均数。经营方式以生产企业自营出口为主,生产企业自营出口、外贸公司出口及三资企业出口比约是2:1:1,生产企业自营进出口比重也远高于浙江与全国平均数。

再次,从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看,台州已完成从传统单一资源驱动型出口模式向以产业结构优化为主、多种模式共存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化;出口商品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及转移相关联,是顺应后者的趋势与承接。因此,台州出口产品结构 with 外向型经济产业结构调

<sup>①</sup> 长期以来,台州当地的外贸公司出口渠道不完善,使当地企业大量通过未经台州海关的自营出口及省级外贸公司出口,一定程度上也造成台州的出口总额在浙江省的比重大大低于当地GDP占全省的比重。

整和升级明显快于周边地区。一般贸易方式一直占绝对优势,2002 年的比重高达 87.2%,高于浙江同期 82.5%。出口商品构成已发生明显变化,主要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仅占 7.1%,工业制成品占 92.9%。台州已脱离以初级产品、轻纺产品为主的中低级阶段而逐步进入以机电、医化产品为主的中级阶段,水产品、罐头、服装、工艺品等低附加值的传统产品比重下降,高附加值的轻工业品、机械和医化产品比重明显上升,并已成为主导出口产业(如表 1 所示)。

表 1 2000 年台州、浙江省、全国外贸出口企业主导行业分布

地区	外贸出口总额 增幅 %	高新技术产品		机电产品		第一位商品			第二位商品			第三位商品			第四位商品		
		比重 %	增幅 %	比重 %	增幅 %	名称	比重 %	增幅 %	名称	比重 %	增幅 %	名称	比重 %	增幅 %	名称	比重 %	增幅 %
台州	52.9	5.8	-7.5	44.4	57.6	医化产品	11.4	38.5	节日灯	8.5	52.1	鞋类	8.2	103.3	阀门、龙头	6.1	62.5
浙江	28	3.99	28.19	32.93	33.47	服装及衣着附件	22.85	14.7	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	13.9	42.8	鞋类	3.85	41.96	塑料制品	2.22	4.18
全国	22.3	20.85	46.1	48.25	32.3	服装及衣着附件	12.65	12.7	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	6.32	22.2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	6.18	53.8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零件	4.03	64.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 年版、《浙江统计年鉴》2001 年版和《台州统计年鉴》2001 年版。

值得关注的是,台州在产业结构调整与出口产品升级上有自身独特性,与浙江(尤其温州)产业一贯以低技术、低附加值的轻工业为主,产品以服装、轻纺等低附加值、小件物品为主显著区别,其出口产品档次及发展速度均高于浙江平均水平。台州外向型经济产业结构演进历程未按发展经济学证明的,首先以农副产品为主的初级产品、然后经过服装纺织及鞋类为代表的轻工业产品,再过渡到机电、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产品发展路径,而是直接从初级产品转入到高附加值的机电、高新技术产品跳跃式发展。这对一个长期缺乏外援、依赖内源民间力发展的经济体而言,是较为特殊的现象。

台州外向型经济地源倾向明显,以 2000 年为例,进口市场基本集中于亚洲(65.3%),贸易对象以国以日本(49.4%)、韩国(7.4%)等东南亚国家为主,对亚洲市场(尤其日本)依赖性比浙江省及全国其他省份更强。近年,台州对日本、韩国等传统进口地区的贸易略有下降,对北美与欧洲进口的增长较快(年增幅为45.9%、43.81%);出口市场则主要集中在欧洲(28.6%)、亚洲(25.1%)和北美洲(22.5%),呈三足鼎立之势,最大出口国依次为美国、德国和日本,分别占出口总额的 20.7%、7.9%和6.6%。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与全国(包括浙江省)基本一致,但倾向性更明显,更依赖亚洲资金,主要以港澳台及东南亚国家为主。

因此,综合台州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可以归纳出以下特征(1)从演进历程看,台州经济的发展与起步是依赖自身区位条件和民间经济自我积累逐步发展而形成外向型经济模式。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内生性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相类似,台州也经历了从初期的单一发展模式到逐步到综合发展模式。台州在发展历程中受自然资源与社会条件的双重约束,只能利用区域内资金技术制造并出口,因此,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民营经济填补了外商与国有投资空白,成为当地外向型经济主体,并形成以生产企业自营出口为主的外贸方式。1994 年,台州逐步走上以传统出口模式、转移产业模式为主,兼顾利用外资模式和两头在外模式的综合发展道路。目前,在台州产业转移模式已成为外向型经济的显著特点。(2)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看,台州经历了初期的资源驱动

型发展模式,发展到目前以结构优化型发展模式为主,辅以原有资源驱动发展模式及近年出现的科技领先型发展模式。因地处东南沿海,气候适宜,自唐代起,台州就是各种传统土特产和手工艺品的主要出口地。20世纪80年代,台州逐步从东南亚国家承接了服装、鞋、工艺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90年代,相继又从这些国家承接了塑料业和源于欧美的医药化工、阀门、汽模业并逐渐成为主导产业。近年,科技先导型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开始萌芽。

## 二、禀赋约束与制度演进的过程之一:非制度因素探源

台州外向型经济的演进路径和现状特征是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及制度与非制度原因,是历史必然演进和人为理性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笔者首先从固有自然禀赋决定的发展因素中寻找内在推动力。

### (一)自然禀赋因素

台州的自然要素禀赋特征决定其外向型经济的结构及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斯密、李嘉图的要素禀赋理论就充分肯定一个地区的要素禀赋对该地区对外贸易模式选择与演进的决定作用,在台州外向型经济的演进过程中,尤其起步阶段,一些关键点上必然烙有固有要素禀赋特征的印痕:

首先,自然资源的约束的影响。台州地处人均自然资源拥有量列全国倒数第七的浙江沿海地区,自然资源极为稀缺,因傍海而居,水产资源充足,1974年发展的水产品一直是当地重要出口产品。有利于非粮食经济作物生长的独特山地气候使其成为农副产品加工出口地。2002年,水产品 and 农副产品仍占出口总额的14%左右。

其次,区位的约束的影响。台州孤处浙江南部一隅,改革开放前,周边均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虽面临东海拥有漫长海岸线和众多港湾、岛屿、渔场,却因多方限制无法开发利用。台州历史上与海外有发达的商贸关系,也因政治原因中断,加之交通闭塞与外界联系困难。这样的地缘区位,虽说历史上发达的商贸关系或多或少为区域文化埋下市场经济的种子,但总体上却使发展备受掣肘。台州因地处中国东南海防前线,一来,得不到上级政府的直接投资和政策扶持;二来,偏离当时以上海、南京、苏州、无锡等大中城市构成的经济辐射圈,承接不到经济中心的扩散效用和较大外资投资。因而,台州自计划经济时,集体经济就不发达,国有经济在GDP中的比重不足10%,外资依存度一直很低。

因而,依赖市场力量、通过民间内源力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似乎是台州在固有自然要素禀赋约束下的惟一选择。这一定程度上为外向型经济发展锁定了依赖路径。

### (二)人力资本因素

特有人力资本的转化与增值弥补了自然资源及区位优势,为台州外向型经济发展提供了市场经济的人力资本。

首先,与市场经济相匹配、普遍存在于当地民众中的特有人力资本形成台州外向型经济的内源力推动的民营性特征。新经济增长理论把人力资本作为内生变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认为人力资本存量增长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尤其在经济起飞前期更具决定意义。对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能否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高度专业化人力资本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人力资本的及时转化,加快与市场经济相关的知识、经验、能力、技能的积累增值,对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都极为重要<sup>[1] p. 38</sup>。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由改革开放带动的外向型经济发展中,台州在自然禀赋方面没有任何

优势,有关资料也表明,其一般人力资源,尤其高级人才也极为稀缺。因此,如果要从要素角度寻求台州外向型经济的人力资本优势,绝不是总体水平而是在于某种特性——体现在人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能形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获得先发优势的人力资本禀赋。这种人力资本转换与增值的先发效应对外向型经济的增长绩效甚至现代化模式、路径选择都非常关键,其中,经营管理能力,特别是经商能力,使台州人较早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通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在进入市场获取商机上占得先机,创造了良好市场条件,弥补了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源的严重不足。改革开放后,台州民营企业产值年均增幅为 44.7%,1984—1988、1991—1995 近十年间,高达 30%—110%。民营经济发展为外向型经济快速成长提供了重要动力支持,在人力资本边际报酬递增下迅速完成民间资本原始积累,填补经济发展中国有外商投资空缺,为当地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民间资金和充分适应市场经济的人力资本。

其次,以与市场经济匹配的区域性人力资本为核心形成的民营经济进一步决定台州外向型经济的模式与特征。硬约束下的民营企业必然要求任何决策成本收益内在化,并突出反映在台州外向型经济发展中的各转折点和飞跃点的最优发展模式及最佳出口产品产业结构选择上(如表 2 所示)。

自然资源缺乏使台州经济发展缓慢,1978 年 GDP 首次突破 10 亿元,人均 GDP 仅为 225 元,第一产业的比重高达 47.3%。缺乏外来资金扶持的台州只有少量依赖本地自然资源的传统产品出口,如柑橘、兔毛、磷石等初级产品,手工制成的绸绣衣、麻帽等纺织品和工艺品,处于通过低附加值产品出口为外向型经济发展积蓄民间力量时期。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后,台州的民营经济出现萌芽,内源式民间力推动经济发展的特征逐步显现,以开发自然和人力资源为启动点、以“两水一加”、“两建一出”为主要内容,进行民间资本原始积累。(1)对前一阶段出口的农、水产品 & 工艺品进行加工,提高附加值,如冻虾仁、脱胶苕麻、麻制品、珍珠出口。(2)黄岩、路桥、仙居、天台、临海等地从台湾、香港等承接了工艺品业的梯度推移,温岭、临海从东南亚地区承接了服装鞋帽业的梯度推移。因此,虽然台州外向型经济仍是单一出口模式,但出口产品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种类增加,粮油食品比重下降,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品及经初加工的土畜产品比重增加,工艺品出口比重下降,但增加了经深加工的节日灯、圣诞礼品及麻制品出口,且比重逐渐超过了原本占统治地位的麻帽、草制品等传统产品。

在面向市场的自我积累和承接外来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台州的民营经济长足发展,经济外向度逐步提高,逐步从台湾、香港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承接了塑料业的梯度推移,实现从日用品塑料到塑料管件等工程塑料、汽模塑料配件的生产转换,成为当地第二大支柱产业,黄岩、椒江、临海、仙居等地从欧美发达国家承接了医药化工业,成为当地最大出口产业。承接于美、德、法、日、意等国,以水暖配件为主的阀门业,结合玉环、路桥等地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和较成熟的车床、铣床等技术优势,使阀门、龙头等成为又一主要出口产品,从日本、欧美等发达国家承接的汽摩业也在原有发达模型技术和成熟发动机开发技术优势基础上使摩托车、汽车及其配件业蓬勃发展,车辆及零件出口成为近年台州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又一亮点。其他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也开始出现。截至 2002 年,台州有外商总投资 60 977 万美元,2002 年,对外经济合作营业收入为 6 262 万美元,合作方扩大到 15 个国家,共投资境外企业 73 家,总投资 1 703 万美元。

因此,台州特定自然禀赋和当时特殊政治环境下的区位条件决定其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缺乏外力推动,依赖民间内源力的推动是在这个时期不得已的次优选择,但却为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潜在人力资本转化为现实提供了发展空间,决定了外向型经济的产权结构。硬约束下的民营企业势必按照市场原则选择资金流向和市场定位,在追求个人收益最大化过程中对出口产品档次与产业结构作出各个历史阶段的选择,从而决定其外向型经济的演进史和现状特征。

表 2 台州历史上主要出口产品的起始年份及最高出口年份

类别		出口商品名称	出口起始年份	最高出口年份
粮油食品类	最早	柑橘	1952	1960
	最迟	冻虾仁	1987	1990
土畜产品类	最早	兔毛	1971	1986
	最迟	脱胶苧麻	1984	1987
纺织品类	最早	绸绣衣	1952	1990
	最迟	工艺手套	1990	1990
机电产品	最早	节日灯	1979	1990
	最迟	人造水晶	1987	1990
轻工业品	最早	劳保手套	1974	1989
	最迟	塑料衣夹	1986	1990
工艺品	最早	麻帽	1949	1957
	最迟	木珠靠垫、坐垫	1987	1990
五金矿产类	最早	麻制品	1985	1988
	最迟	碓石	1966	1990
化工医药保健类	最早	药用纱布	1978	1983
	最迟	3- 氯基- 4- 甲氧基乙酰苯胺	1990	1990

资料来源：《台州地方志》统计数据包括了 1949 年至 1990 年的情况。

三、禀赋约束与制度演进的过程之二：制度因素探源

杨小凯的新兴贸易理论为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提供了统一理论内核。他认为理性人对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选择原理相同，都是折中处理专业化经济与节约交易费用两难冲突的结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卷入国际贸易及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程度同样取决于该地区的分工水平和交易效率<sup>〔2〕</sup>pp. 77-79）。缺乏外来资金推动、基本依赖民间积累的江浙地区，因资金和劳动力约束势必导致企业规模偏小，产业（产品）以“轻、小、加”为主。为提高产业和区域经济竞争力，就会依地缘形成典型的“小企业、大产业”块状经济格局，使区块内企业享有一般小企业不具备的外部规模经济，共享公共基础设施、与生产相关的资产专用性很强的配套服务以及市场、技术、管理等方面知识的溢出效应，享有分工经济，包括不同区域块状经济间根据比较利益进行区际分工，获得生产率增进和同一块状经济内企业间分工带来的生产率增进<sup>〔3〕</sup>p. 178）。因而，江浙一带发达的分工体系不仅造就了区域经济的繁荣，推进了内源性民间力量积累，也为台州外向型经济发展提供了发达的分工和专业化体系<sup>〔4〕</sup>pp. 35-40）。那么，是否存在能有效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就成为其能否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关键。

基于上述考虑，笔者将试图寻求台州外向型经济演进的更深层次原因——制度因素，借此说明台州之所以形成以内源民间力量推动为基础的外向型经济的关键在于：与市场经济高度兼容的区域商业文化环境促成市场化快速推进并形成充足民间企业家资源，作为制度提供者的地方政府和作为制度需求者的微观经济主体为寻求制度变革中的共同经济租金最大化而携手，成为了当地制度创新中的“第一行动集团”，互动合作，有效解决了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中的激励和交易效率问题。

（一）初始制度分析

从历史角度切入的初始制度分析表明，民营经济奠定了台州外向型经济的私有产权基础。路

径依赖理论指出,初始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因为沿着原有制度变革路径和既定方向的前进或修正,总比另辟路径更便捷。既然“西方经济史上一个产生于西欧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发展导致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兴起及数千年的辉煌”(5 [pp. 5-6]),那么,同样能从台州上千年外向型经济发展史中寻求制度演进的历史根源。

首先,与市场经济高度相容、数千年的区域商业文化和对外经济关系不仅孕育了适于市场经济的潜在人力资本,也形成了比中国内陆地区更能与外界融合的市场关系,降低了对外贸易的成本。历史上多次设立通商口岸,临海而居远离中原统治中心的浙江台州一直是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自唐代起,台州就开始与日本、新罗等国进行贸易,唐、明时期,是全国重要的对外贸易场所;即使清代海禁时期,海门一带仍有大量民间走私贸易,对外经济关系从未中断。

其次,因缺乏上级政府扶持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和不能提供足够的制度租金,这促使制度提供者——台州政府彻底改变初始制度的演进路径,形成“体制落差”,并造就了市场化改革的先发效应与内源民间力量的发展,提高了区域经济的交易效率。诺思认为,作为“公共物品”的制度变革就是改变制度原有演进路径和方向,而利益因素是形成路径依赖的深层原因,制度变革也就是利益格局的调整与改变,而理性制度变革主体的动力源于制度转换过程中可能的耗散租金的攫取。

建国后,中央扶持政策的缺失使台州政府不能从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中获得足够租金,因此,没有足够激励推进强制性制度变迁(不同于苏南模式下基层政府)形成了台州与内地的体制落差,为体制外民间经济预留了发展空间。20世纪70年代的改革开放,台州是对原有体制外经济的认可,政治风险下降,苏南地区的制度变革动力和主体主要源于社区政府,是新一轮供给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加上前一阶段改革的不彻底,缺乏集体资产积累、社队经济薄弱,受历史延续的区域商业文化熏陶,台州很快走上民营企业为主的工业化道路,奠定了外向型经济的民营化基础。

因而,正是“历史传统”和“区位条件”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路径依赖效应,决定台州外向型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依赖自发性内源民间力推动的民营化基础,而这种明确私有产权制度的形成,也为当地早期实行区域开放创造了条件(6 [pp. 54-60])。

## (二)制度演进分析

制度变迁角度的分析表明,在制度演进中,台州政府与微观经济主体,发达专业市场与外向型企业的双重互动不仅降低了与外界市场的对接成本,也减少了制度变迁中的摩擦成本,为外向型经济发展扫清道路。制度变迁实质是制度的替代、转化与交易,制度变革势必引起利益格局调整 and 变化,导致变革阻力或摩擦成本。但如果现有信息能使利益相关者意识到面临的制度变革是一种“目标模式”(效益更高的制度)对“起点模式”(另一种制度)的替代,那么,只要重新分配制度变革租金的交易成本低于制度改进收益,即使这种制度变迁只是“希克斯”而非“帕累托”改进,利益相关者也能通过“串谋”,达成合作博弈、共同分享制度变迁租金来推进变革(7 [pp. 21-22])。

首先,从外向型经济相关制度环境的演进看,作为制度提供方的台州政府通过在制度演进中与微观经济主体的合作博弈、分享租金,调整自身功能定位,为内源性民间力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1)消除阻碍市场经济发育的政策性歪曲(由于政府对经济过多干预而导致市场难以发育)和自然性歪曲(由于民间部门自身弱小或存在不利于市场发育的社会因素而导致市场经济发育迟缓)(2)对不能自然发育的市场经济特性,发挥制度功能,行使促进市场经济诞生和发育的“市场创造者”角色。换言之,台州政府可定义为既不同于苏南模式的“合作型”政府,也不同于温州模式的“辅助型”政府的“互助型”政府(8 [pp. 20-22])。地方政府利用国家赋予的“让权放利”等优惠政策,以独特的地理区位、土地和劳动力等优势,与外来资源相结合,在必要时候借助行政、经济力量,调动行政区域内的人财物,配合本地或外来资源兴办经济实体或推动其发展壮大,促进经济

发展。表 3 简要说明了台州政府与各类外向型经济主体间的关系及功能。

表 3 外向型经济中“合作型”“互助型”“辅助型”政府异同比较

	“合作型”政府	“互助型”政府	“辅助型”政府
经济起飞阶段 政府作用		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起步	
社会管理职能		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结果		实现农村工业化、经济起飞及 外向型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战略	外源型：借助上级政策扶持 和外力推动	内源型：民间内源推动与基 层政府主动推进相 结合	内源型：单一的民间内源推 动与基层政府的被 动协助
政府企业关系	主导：地方合作主义	外部服务：“准合作管理”	相互独立
资源动员方式	借助行政力量、引进外资	以民间力量为主，配合外资	
行政参与程度	直接参与经济组织和调控	有限参与	几乎不参与
管理手段	内部管理和控制	引导、扶持等外部助动	宏观调控
利税主要来源	税收及参与企业利润分配	收费、资产性收益及参与 制度租金的分配	收费和资产性收益

其次，与温州相比，台州的微观经济主体更愿与政府合作，共享制度变革收益。在外向型经济发展中，台州企业家有很强的寻求政府支持、通过与政府合作来推进对自身有利的制度变革以获取经济利益的偏好。这种特点明确反映在两地选择的支柱产业和出口产品结构变迁上。台州的支柱产业主要是医药化工、汽车、摩托车等国家管制行业，企业家通过当地政府为支点与中央政府博弈后进入，从中攫取巨额利润。相反，温州企业家往往选择服装、鞋、低压电器等计划经济体制外的行业，通过回避政府管制来壮大民间力量，推动经济发展。这也导致台州内源性民间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升级快于温州。

因此，“互助型”基层政府与偏好向政府寻租的微观经济主体作为台州制度变迁的供求者，必然在制度变革中“串谋”并携手成为制度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在双方互动中推进制度演进。而台州政府与微观经济主体间的互动促进了民间力量积累，降低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成本和外向型经济的交易费用，推进了外向型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

（三）具体的制度安排分析

杨小凯引入交易成本的新兴古典贸易模型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实现相互分割的局部市场一体化，势必依赖交易效率的提高来扩大市场容量<sup>[21 p. 77]</sup>。赵伟在市场经济国家早期区域开放理论中也提到，市场经济国家早期区域开放的两大前提条件之一是繁荣的地区（内）贸易<sup>[61 pp. 54-60]</sup>。因而，笔者还将从市场关系角度对台州外向型经济发展动因作补充解释。

首先，由内源性民间力量推动经济发展，必然要求在工业化初期，企业建立直接面向市场，享有控制权的规模大、辐射广的销售网络。在当时的经济体制下，民营经济是典型的体制外经济，不能直接利用计划经济原有销售渠道，而必须面向市场重新建立企业拥有控制权的销售网络。这种销售网络不仅使内源性民间推动发展模式更有利于区域内的资本、企业家资源积累，也对外向型经济的产生重大影响。

其次，民营企业主导的内生性销售网络与外力控制的销售网络相比，从短期看，尤其外贸起步阶段，内生性销售网络下的区域市场难以形成规模经济。长远看，区域市场与外界市场更具相容性，更有利于外向型经济发展，历史上，作为体制外经济存在的民营企业，不能直接通过服务于体制



内经济的国有外贸公司出口,民营出口企业要进入国有外贸公司主导的出口渠道,就和进入国际市场一样要支付破除壁垒成本,这使大量企业不得不选择自营出口。在经济发展初期,这是企业的次优选择,因为在国际市场,企业不可能像国内一样依赖地缘优势,通过建立专业市场提供的共享销售网络以替代外贸公司的贸易规模经济。但长期而言,这种内生性市场关系更具市场特性,使依之而生的企业更易于与外界市场及国外企业与台州市场对接<sup>[9]</sup>(pp.49-54),降低了从国内贸易到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实现了区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一体化,促进了外向型经济发展。因此,这种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内生经济关系,不仅降低了产业转移成本,也易于转移后的生产企业与原有国际销售渠道相联接,确保台州能逐步承接七大产业的梯度推移,实现外向型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

最后,台州专业市场本身就是外向型经济主体,与民营企业互动,进一步推进当地产品产业结构升级和外向型经济发展。专业市场不仅是交易场所,也是外向型经济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限额以上贸易企业中,由专业市场带动的再生物资回收企业占贸易企业总进口的68.4%,社会总进口的26.3%,居同期所有进口商品首位。目前,路桥、椒江一带经营废旧电器拆解、加工企业(包括经营户)有2000余家,年产值20亿元,是台州主导产业之一。进口的废旧金属不仅为经济起步和产业结构转移提供了廉价生产资料和稀缺资金,本身也是联结国内外市场的重要窗口。

因而,台州依赖民间力量而内生的发达专业市场和天然具有市场经济特性的市场关系,不仅具备一般推动民间力量及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市场功能,而且也提供了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促进联结国际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制度保障。

####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对台州外向型经济发展历程、现状特征和模式的归纳分析,追溯了其演进的自然资源、区位、人力资本等要素禀赋约束以及深层次的制度根源。台州外向型经济发展是理性台州人结合当地实际,创造性地贯彻中央改革开放政策、注重激发人民群众创业热情和创新精神,而成功走出的一条依靠民间力量的内源积累、实现基层地方政府与微观经济主体和专业市场与民营经济主体双重互动的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

作为发展中国家,广大西部欠发达地区,同样存在经济现代化的两大基本要素——资金和企业资源的严重短缺,导致外向型经济的启动和推进困难重重。因此,内源性民间力推动的、有效借助“互助型”基层政府和发达专业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台州现象”,对此问题可能有一定借鉴意义。然而,任何一种外向型经济都不是一个静态格局,而是一个动态过程,处于不断创新和发展中。从起点看,一项新制度的选择,首先要考虑当地特点,制度供给不同于商品,是既定制度遗产、制度结构或制度环境共同形成的,确立一种新制度也必须考虑正式及非正式制度安排乃至现存的包括宪法在内的制度秩序、制度设计成本、现有制度知识积累、实施新制度安排的预期成本、规范性行为准则、公众态度以及上层决策者的预期收益等。只有通过渐进的、不是非常完善和规范的制度选择,先促进经济的一定发展,再推动制度变迁,这种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的交替演进才是最佳方式。这是具有一般意义的全国各地都可借鉴的经验,不是囿有具体的“温州模式”或“台州现象”,而是启示各地朝着市场经济目标,依据本区域特性,做出经济人的理性抉择。“人们可以根据本国和本地区情况创造出有关市场经济模式的各种修订本……在统制经济模式到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的‘夜警国家’模式之间有一个区间,在这个区间里存在多种选择。”<sup>[10]</sup>(p.216)因此,笔者认为并不存在评价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优劣的统一标准,关键在于寻找最适合本地区特点,能在现有约束下最大化自身收益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 [参 考 文 献]

- [1] 王辉. 渐进革命[M]. 北京: 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8.
- [2] 杨小凯, 张永生. 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 [3] 史晋川, 金祥荣, 赵伟, 等. 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 温州模式研究[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2.
- [4] 郑勇军. 内源性民间力量推动型经济发展: 浙江经验[J]. 浙江社会科学, 2001(2): 35-40.
- [5] 道格拉斯·C. 诺思, 罗伯斯·托马斯. 西方世界的兴起[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 [6] 赵伟. 从国际化到区际化抑或从区际化到国际化——中国两大三角洲经济转型中的开放路径比较[J]. 浙江社会科学, 2002(3): 54-60.
- [7] 道格拉斯·C. 诺思.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 上海: 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 [8] 颜璐, 邓璇. 外向型经济背景下“助动型”政府运行机制探析: 以东莞厚街镇政府为例[J]. 经济前沿, 2002, (11): 20-22.
- [9] 徐维尧, 卢丽华. 小企业与大市场对接的内涵、特征及对接度研究[J]. 中国工商经济, 2001(7): 49-54.
- [10] 陈建军. 中国高速增长地域的经济发展——关于江浙模式的研究[M]. 上海: 三联书店, 2000.

[责任编辑 徐丽静]

## From the Factor Endowments and Institution Evolution Perspectives , the Development of Out-oriented Economy

——Takeing Example for Taizhou

SHI Jin-chuan , WU Xiao-lu

(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27 , China )

**Abstract:** From the factor endowments and the institution evolution perspectives , offering a conceivable interpreta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aizhou 's out-oriented economy is the main subject of this paper.

At the very start , this paper starts off with looking backward the paths of development and summarizing the general situations of Taizhou 's out-oriented economy ,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 patterns of the evolution of out-oriented economy in "Taizhou economical phenomena" are concluded in the part I of this paper. Secondly ,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 the part II and the part III of this paper focus on tracing back respectively the factor endowments , such as natural resources , location , human capital and so on , and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which are depended on. Finally , this paper defines clearly the essential conno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Taizhou 's out-oriented economy. Namely , according to existing constraints , the path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aizhou 's out-oriented economy is the optimal choices which have been made by rational Taizhoumen in every phase of history ; then it depends basically on the accumulation of internally private funds , furthermore it not only has carried out creatively the regulations from the upper governments , but also stimulated furthest indigenes to greatest effort . ; eventually , it has gained remarkable success by achieving double reciprocations , viz. one is the reciprocation between the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microeconomic

entities , the other is the reciprocation between the special markets and the private economical entities.

Consequently , this research shows that , depending mainly on the accumulation of internally private funds , the "mutual aid"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developed specialized markets , the patter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aizhou ' s out-oriented economy are the optimal choices under existing resources constraints. This unique orbit of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out-oriented economy not only provides a mass of very valuable material for academic studies ; but also presents west poverty-stricken regions which are highly short of funds and entrepreneurs with the guide to develop local economics relying on developing out-oriented economy. Furthermore , the more important signification of this study lies in the more general conclusion that , in fact , there is not a simplex indicator of evaluating out-oriented economy , the key is to discover the optimal development pattern of out-oriented economy which maximizes income under existing resources constraints.

**Key Words :** the development of out-oriented economy ; factor endowments ; institution evolution

本刊讯 2005 年 7 月 4 日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张洪明教授应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邀请 ,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作了题为《语音与语法的界面关系——山西平遥方言连读变调例证研究》的学术报告。在报告中 ,张教授从短语音系学角度探讨了语音和语法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相关本质 ,认为表层语法信息首先映射到由韵律成分组成的一个结构上 ,音系规则运用是在词以上的韵律成分范围中进行的 ,语法不能直接支配语音 ,语音和语法之间有一个起中介作用的韵律结构。他通过对山西平遥方言连读变调的研究 ,分析了相关流行理论的价值及失误所在 ,提出了相应的理论解释模型 ,并对语音和语法之间映射关系的本质特点作了探讨。随后 ,张教授又从自己的个案研究谈到了语言研究的方法论 ,他指出 ,语言学研究需要运用一定的理论和方法 ,但必须以具体的语言事实为依据 ,以此来揭示和说明语言的普遍规律在具体语言中的适用性 ,进而为一般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

本刊讯 2005 年 9 月 9 日 ,中国科学院知名学者孟建伟教授应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邀请 ,在浙江大学作了题为“弘扬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学术报告。在这次报告会上 ,孟建伟教授从科学与人文学科出现学术危机的现状出发 ,深入探讨了关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问题 ,尤其是如何理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 ,如何弘扬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意义等问题。他认为 ,科学与人文不是对立的 ,而是相辅相成的 ,当前的教育应该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共同发展。